

反覆強調，並不把地理疆域與地理邊界視為主要分析框架與關注對象，但由於全書的論述依然是圍繞邊境地區展開，對地理環境的情況與影響加以適當的論述，可使論證更加豐富與完整。其二，該書所利用的主要史料之一《契丹國志》，作者按照其為宋人葉隆禮所著加以分析和利用。不過事實上，《契丹國志》一書的情況比較複雜，劉浦江曾專門撰文指出，此書的作者和著作年份均出自杜撰，是一部書賈託名的偽書。雖然此書保留了一些他處不見的記載，仍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但若將此書與其他資料對比進行歷史編纂的分析，則需格外慎重。

《無疆之忠：越境於遼》一書在開篇便指出，目前對於「唐宋變革」的研究，在時段上既有不連貫之處，亦忽視了遼的作用。而此書以獨特的視角、細密的論證，對這兩個研究薄弱之處，作了極大的推進。

李怡文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Public Success, Private Sorr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1857-1938), China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Pioneer Translator. By ISIDORE CYRIL CANN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xvii, 260pp.

肯西爾 (Isidore Cyril Cannon) 這部著作是關於布韋—泰勒 (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的傳記。布韋—泰勒是自19世紀80年代起任職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海關的英國人，亦是中國著名小說《三國演義》首部英譯本的譯者。萊特 (Stanley F. Wright) 的《赫德與中國海關》(*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和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的《馬士：中國海關稅務司和歷史學家》(*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基本上從制度史的角度分析外籍海關人員對晚清現代化的作用。本書則嘗試通過家族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形象地描述布韋—泰勒在中國公私生活的實況，並強調不少外籍人員在處理晚清時期外國壟斷貿易、內部動亂和現代化等問題時，是出於個人的選擇、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以及協助中國發展的願望。這打破了以往學界視外籍海關人員為帝國主義在華代理人的論斷。

作者在引言中談及本書的分析架構時，首先指出布韋—泰勒是一位很少

談及私事的人。布氏的男孫向作者提及，當他的母親向布氏問及其早期生活時，布氏經常給予模稜兩可的回答。作者認為布氏的含糊其辭，是為了隱瞞一些在他的生命中令他尷尬和不安的事情（頁3）。綜觀全書，作者並不如「弗洛伊德式」的歷史觀般，過分強調以個人心理結構作為分析歷史人物的基礎。然而，個人的性格和家庭生活，在研究個人在歷史脈絡中的選擇，仍有其重要的作用，作者在這方面的處理是恰到好處的。

作者在引言中亦指出，論者普遍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是為了爭取個人在本國所得不到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而他們亦成為帝國主義擴張在中國的代理人。然而，作者從不少在中國活動的外籍人士的私人書信中，發現當中不少是出於對協助中國發展的期望，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而來中國工作的。作者強調，他們在工作時間可能是以追求個人利益為目的，但在工餘時間，他們會從事溝通中西文化的漢學工作。因此，作者認為，這批包括布氏在內的海關外籍人員，雖然在公私生活兩方面的目的是如此不同，但不能抹殺他們在中國現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頁7-8）。肯西爾的著作，是繼費正清的馬士傳記後，另一部填補海關外籍人員作為西方漢學群體研究空白的傳記式著作。不同的是，馬士是中國史學研究者，而布氏則是中國通俗文學的翻譯家。

本書除第一章的引言及最後一章的總結外，共分為17章，以一般個人傳記的方式，按時序撰寫。第二至第四章介紹了布韋一泰勒的家族背景，在倫敦的早期事業、婚姻，以及當時中國內亂和現代化為外國人所帶來的個人發展機會。第五章分析布氏在多名孩子夭折、法軍炮轟福州，以及當時在華的西籍上層社會歧視漢學的環境下，開始在皇家亞洲學會期刊出版中國文學的翻譯。本章亦提到布氏妻子之死成為布氏人生的分水嶺。第六章介紹中國海關在總稅務司赫德領導下的發展。第七章至第15章，以義和團之亂、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為時代背景，敘述布氏由1891年至1919年在中國海關的服務生涯。布氏一方面成為稅務司（Commissioner），達成自己成為在華洋人精英社會領袖的目標，但另一方面，又受第二任妻子米爾（Ann Amy Janenée Michie）的精神病和懷疑不忠，以及他的麼兒偉文（Raymond Brewitt-Taylor）在一戰中戰死的打擊，這正切合本書「公事斐然，私事遺憾」（public success, private sorrow）的主題。第16及17章敘述了布氏從事《三國演義》的翻譯工作和在英國的退休生活。最後一章總結了作者對布氏個人性格的評價，並且將布氏放在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強調當時的帝國主義有其多樣性和雙向性，外籍人員既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又是溝通中西文化

的橋樑。

綜觀全書，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分析布氏如何從作為鞋匠兒子的藍領階層出身，通過不同的方法以提高社會地位。首先，他將姓氏由泰勒，加上連號變成布韋—泰勒以示突出。其次，他努力學習中文，在皇家亞洲學會學報發表漢學研究文章，翻譯《三國演義》，重編中英對照的《新關文件錄》（*Text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奠定自己漢學家的地位，以取得極重視中文學養的總稅務司赫德的信任。種種的努力，再加上迎娶和赫德熟識的米爾家族的女兒為妻子，令布氏在加入中國海關的短短八年內，便晉升為在華洋人精英社會領袖的稅務司，打破了當時的紀錄。漢學家加上稅務司這崇高的公職，讓布氏達成了儒家學者和出色官員這雙重角色的典範（頁177），這有助於他打破在洋人上流社會的社會邊緣性，以及作為外國人在中國的文化邊緣性。以往學界研究在華洋人群體，研究的對象多來自中產或上層社會。布氏不但要應付一般洋人在中國面對文化邊緣性的問題，更要面對社會邊緣性的問題，本書為讀者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了解在華洋人適應生活的問題。

然而在分析為何布韋—泰勒鍾情於中國古典文化的問題上，肯西爾的解釋有欠說服力。作者指出，中國在1877年派遣留學生到位於格林威治的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當時布氏剛好與當地的皇家天文臺有緊密聯繫，因此認為布氏很可能曾經跟這些留學生學習中文。另一例子是，作者指出，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曾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當時布氏亦正在天津海關服務，相信他們之間有一定交往，對翻譯對方的文化發生興趣（頁18-19、38-40、75）。由於沒有實質的證據，布氏的個人日記及私人信件亦未能提供相關的資料，因此作者的推論只能存疑。

另一方面，作者亦嘗試分析布氏選擇翻譯《三國演義》的原因。作者認為，出身於下層社會的布氏同情當時中國文化在世界被邊緣化的處境，加上他冒險在異鄉發展個人事業的野心，以及當時中國的混亂情況，剛好與《三國演義》所推崇的個人素質和著作的時代背景吻合，因此他才前後花了近四十年，完成首部完整的《三國演義》譯本（頁175-176、178-179）。然而，由於譯作初稿在1900年毀於義和團運動，譯作遲至1925年才能出版。

作者認為，當時在華生活和從事不同活動的外國人可分作三類。第一類是「文化和社會的孤立主義者」（*cultural and social isolationists*），他們是在華洋人群體的多數，通常和商業有密切關係，他們完全保持西方的生活方式，盡量避免與中國人接觸，鄙視任何學習和崇拜中國文化的行為。第二類

是以傳教士為主的「文化同化者」(cultural assimilationists)，他們穿着中式服裝及梳辮子，盡量減少和本地中國人的差別。第三類是「文化同情者」(cultural empathizers)，他們一方面保持西洋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熱愛中國文化，有些甚至因而成為漢學家。作者認為，布氏屬於「文化同情者」(頁181)。作者這種分類較為粗疏。布氏翻譯《三國演義》，既可以是熱愛中國文化的表現，但亦可能是他為了成為漢學家以爭取社會地位的手段。因此，說布氏同情中國文化顯然有點武斷。

雖然海關的日常事務並不是本書的重點，但作者通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海關檔案，以及當時和布氏有聯繫人士的日記等資料，反映了晚清至民國初期中國海關的部份情況。例如，作者以布氏在雲南蒙自關擔任稅務司的事例，指出稅務司除了確保海關稅收外，亦是令在華外國人明白中國本地風俗習慣的重要文化橋樑(頁106、108)。布氏在北京擔任海關學院的主管(Co-director)，學院向將會成為中國海關高級人員的中國學員教授中世紀歐洲的歷史，作者認為這是帝國主義教育的一個例證(頁122)。這反映了布氏在私人生活中從事中國文化相關的工作，但在公務上，或多或少扮演着帝國主義代理人的角色，而他並不認為兩者有矛盾。

作者又引用布氏擔任福州稅務司時撰寫的報告，指出中國民船(junk)的船身沒有船名或數字作記認，加上它們船速高，很容易避開海關的追截，以從事走私活動(頁131-132)。然而作者對這些海關實際運作的論述極為簡略，其中以最後一個例子最為明顯。事實上，由晚清至民國初年，中國民船走私的情況甚為猖獗。外國商行購買中國民船從事貿易，以及民船的中國籍船主通過懸掛外國國旗，逃避海關、釐卡徵收關稅、釐金的事情時有發生，當中以廣東省沿海和香港地區最為嚴重。布氏在1900至1901年曾擔任汕頭的代稅務司，作者如能引用當地的海關檔案資料，相信能對這種中國民船和外國商船身份交替使用的情況，有進一步的分析。

總括而言，以往學界強調中國海關洋員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又或是他們如何扮演着帝國主義代理人的角色，本書則提出海關洋員群體中不乏對中國文化同情者，他們亦具有作為中西文化溝通橋樑的作用。雖然作者的部份論証較為粗疏，但本書依然是了解晚清至民國初期，中西文化溝通歷史的重要參考著作。

蔡思行
香港大學歷史系